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5年6月22日

有所思

# 从“德国之欧洲”转向“欧洲之德国”

□孟钟捷

在德意志历史上，对于“帝国”的认知及其造成的各种心态，是其国家定位发生转向的重要动力。

## 神圣罗马帝国

对于德意志人而言，帝国的最初印象来自罗马。凯撒北征高卢时，为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蛮族（德意志人正是其中的几支部落）带来了极具震撼力的皇者之风。随后一千年间，罗马皇冠成为欧洲各大民族的争夺对象。当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终于在公元962年从罗马教皇手中抢过这顶皇冠时，德意志首次与“帝国”这个身份紧密相连。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的模仿之举：自称“奥古斯都”，后采用凯撒之德语译名“Kaiser”（即皇帝）；定国号为“罗马帝国”，12世纪后改为“神圣罗马帝国”，以此与教廷抗衡；以武力开疆辟土，到11世纪中叶最盛期，德意志人的统治区域北抵北海和波罗的海，向东扩展到波西米亚，南方覆盖今天的意大利，西面掌控洛林地区，当时在位的亨利三世因此被称为“上帝在地球上的总督”。

然而，任何帝国都有兴衰周期。尽管德意志人的帝国之名直到1806年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方才消失，但帝国之体早已在16世纪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中变得千疮百孔。1356年的《金玺诏书》旨在排斥教皇对德意志事务的干涉权，但在实践中却弱化了中央权力，推动了诸侯邦国分立制度的形成。1517年启动的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冲突乃至三十年战争，把德意志送到了权力纷扰的火山口，内部裂痕继续加剧，帝国疆土遭到分割。正因如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才以戏谑的口吻，讽刺德意志人的国家名不副实，“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 德意志帝国

即便如此，德意志人的帝国幻想却未曾在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中消褪过。一批浪漫主义者致力于把帝国历史神圣化，如文学家诺瓦列斯说，“德意志特性是同最强大的个性混杂在一起的世界主义”，政治学家亚当·米勒呼喊道，“这种伟大的欧洲民族的联邦制……将披上德意志的色彩；因为在所有欧洲机制的伟大、根本与永恒之处，都体现出德意志色彩”。1848年革命终于让民族统一的呼声超越了“文化民族”的自信心，但“帝国”却依然没有退出德意志人的政治视野：1867年奥地利德意志人成立了奥匈帝国；1871年普鲁士构建起德意志帝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主义风起云涌的背景中，以民族统一为名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很快显示出自己的扩张野心。威廉二世一改俾斯麦的稳健外交，以“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为名，在亚洲、非洲、太平洋范围内四处出击，并最终酿成世界大战。在这一追求“世界政策”的进程中，从知识精英到普通德国人都沉浸在“非自由主义”（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语）的精神氛围中，以“臣仆”（德国文学家亨利希·曼的小说）的姿态欢呼帝国的每一次扩张之举，甚至还把世界大战美化为“英雄与商人之战”。

## 魏玛共和国

1918年11月，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二个帝国仓促落幕，取而代之的第一个民主体制——魏玛共和国——却依然生活在强大的帝国文化阴影之下。这个新国家的官方名字仍然是“Deutsches Reich”（意为“德意志帝国”，中文为区别1918年之前的情况，一般译为“德意志国家”），从总统、总理到内阁、法律都被冠以“Reich”之名。被誉为“魏玛宪法之父”的普罗伊斯在国会中表示：“‘Reich’这个词、这种思想与这种原则，对于我们德意志民族而言，具有一种特别深层次的感情价值。我相信，我们不会答应放弃这个名称的。”这种神化帝国的做法自然得到了保守派知识精英们的推进。1923年，范登布鲁克完成著名的《第三帝国》一书。他鼓吹成立一个“共和性质的帝国”，要求“兼并奥地利”，最终“应当自德国人手重建堕落的欧罗巴世界”。

## “第三帝国”

10年后，希特勒实现了德意志人重建帝国的历史愿景。早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就要求建立一个“民族帝国”。这个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三个帝国不仅把历史上的失地夺回来，而且还一再动用战争的形式来掠夺更多的生存空间。到1941年，它所控制的区域已数倍于1933年前的德国本土面积，约占欧洲陆地面积的7%。此外，它还一改此前维系多民族共存的帝国治理模式，采取了极端种族主义的屠戮手段，把六百万犹太人送进焚尸炉。

## 战后重新确认身份

物极必反。当德意志人的帝国幻想在纳粹统治下达到巅峰时，其后招致分割的命运也由此注定。在1945—1991年间，德意志人不得不面对被盟军分区占领、进而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残酷现实。“帝国”之后，德意志人甚至失去了民族国家这一当时流行的政治身份。不仅如此，无论是帝国的历史还是历史上的帝国，都遭到了学术清算：推崇“帝国”的普鲁士学派被视作“德意志特殊道路论”的始作俑者，受到了左翼历史学家们（如比勒菲尔德学派）的猛烈攻击——后者认为，前者既低估了神圣罗马帝国分权结构的意义，即多元民主远胜于集权专制，又试图掩饰“德意志帝国”扩张意图的恶果，甚至推延人们对“纳粹帝国”种族屠杀加以深刻反思。在此影响下，试图建立“德国之欧洲”的帝国观不再受到热捧。

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德国找到了另一种发展目标：“欧洲之德国”。从煤钢联营到法德和解，直至《罗马条约》，（西部）德国沿着阿登纳提出的“欧洲的希望在于欧洲联盟，在于联合的欧洲”这一思想坚定前行，与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政治联盟”等议题上踯躅不前的法国形成了鲜明反差。

## 欧洲的德国

突如其来的统一，再次让德意志人面临国家定位的挑战。究竟是延续传统的帝国形态，还是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这一次，德意志人战胜了“帝国”诱惑，仍然坚持“融入欧洲”的做法。后来担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的菲舍尔曾提出“‘欧洲优先’必须仍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种主张，并得到了多数高层政治家与普通民众的认可。在2001年的德国民调中，74%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可以吸取历史教训，以便不再犯从前的错误”。

当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联合趋势一再加强时，会不会出现一个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帝国”呢？从最近的金融危机来看，这种担忧的确有其合理性。在欧元区中，唯有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德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中。但是，如若我们注意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力挽狂澜、坚持维护欧盟的立场，甚至还在6月5日表示“为留住英国而愿意修改欧盟条约”，便不应对新德国的国家定位心存疑虑。如同英国学者齐隆卡所言，“作为帝国的欧洲”是把共和制、多元性与普世性结合在一起，那么属于这种“欧洲帝国”的德国也不应再有咄咄逼人的称霸意图。

刚刚去世的德国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曾发明新词“昔今未”，旨在把过去、当下与未来三种时间扭结在一起，以此揭示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都是指向现实与未来的不自觉行为。在过去一千多年中，德意志人对“帝国”的美化、幻想或批判，事实上正是寻找国家定位的准备。从“德国之欧洲”转向“欧洲之德国”，德意志国家定位的重大转向提示各方：与时俱进地吸取历史教训、摆正国家心态，才有可能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重塑自我形象，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真正捍卫者。

中外制度史

# 议政王大臣会议起与落

□鲍家树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军入关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约一个半世纪里，由满洲王公、大员及个别蒙古、汉军旗人官员组成的议处国家大政的制度，也是重要的政务决策组织形式。它在后金、清初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皇权的越发集中，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走向消亡。

努尔哈赤初创八旗时，已经出现了议政制的雏形。《清史稿》记载“每旗设总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号为议政五大臣。”这可以算作“议政大臣”制度的萌芽。努尔哈赤设议政大臣之初，其职能主要是听讼审判，处理女真族内部的民事纠纷。可以说，议政大臣仅仅是努尔哈赤处理民事的助手，充任此职的人等级也比较低。随着后金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政务需要处理，加之统治者理政经验不足，所以努尔哈赤把议政大臣的地位和职能不断升级。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即所谓的“八王共治”，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共同讨论决定。天命八年（1623年），在八和硕贝勒之外，又设八大臣，负责勘察贝勒是非、议论国政得失和战事情形。作为特设的中枢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当时战争频仍的情形下，将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广开言路、群策群力，举贤任能、罢斥奸臣，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做了政治架构层面的准备。此时的后金政权仍属草创，依赖贵族亲王，扩大其统治基础，对努尔哈赤而言，也是一种不得不做的让步。

皇太极统治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有了相对固定的议政地点，参会成员也更加明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权力在逐步走向弱势。内三院等机构的相继设立，分割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国政的权限，较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时的强权状态已明显缩小。虽然此时“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议政王大臣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性质仍然未变，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权倾部议，但其权势始终在皇帝之下。大凡军国大事，都须由皇帝裁决。实际上，这种改变反映出皇太极对议政王大臣会议共治国政的抵触，他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的权势，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如天聪三年（1629年）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剥夺了其他三大贝勒的实权；天聪四年（1630年），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定其欺君误国十六大罪；大贝勒莽古尔泰也因“御前露刃”获罪，被降为一般贝勒。这样一来，皇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皇太极南面独坐，诸王大臣唯皇太极命是从。

清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经历了皇帝与旗主、诸王之间的不断斗争而逐步实现。皇太极死后，多尔衮摄政，独当大权，以“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由，限制王公干政，进一步推进了皇太极以来的集权统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后，有议政资格的王公大臣、贝勒贝子的势力得到恢复并壮大。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进入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职掌权限也显著扩大。举凡封藩建制、出师征伐、决科断狱、礼聘嗣典等，都在议处之列。同时，汉人范文程、安达礼、宁完我等也先后受命为议政大臣。这种调整有利于缓和满汉关系，稳定清朝政局。但是，从顺治某些政治举动，如削弱亲王贵族权力、亲掌上三旗等来看，流露出其对皇权被分割这一状态的不满与抗争。

康雍乾时期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职掌范围和权力逐渐缩小并最终走向消亡的时期。

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挑选亲信入值，使南书房逐渐成为皇帝亲自控制的核心机要秘书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核心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以便更直接地行使皇权。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实施高度集权的关键步骤。加之康熙一并采用了“内阁”“九卿科道会议”“御门听政”等中枢决策方式，同时重用皇子，使得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被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雍正在位期间，奏折制度已经非常完善，通过扩大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大批地方官可以向皇帝直接报告，使得进一步抛弃满族早期民主共议制成为可能。雍正七年（1729年），设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承旨遵办军政事务。同时，创建朱批密折制度，一切都由皇帝“乾纲独断”，议政王大臣会议变成一些不当权的贵胄世爵挂靠之所，虽然名义上继续存在，但实际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出巡、旗务及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此，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颁布上谕，“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取消了议政王大臣的职名，至此，议政王大臣连具虚衔的可能都没有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一律向皇帝集中。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军事民主的原始氏族遗风在政权机构中的反映，它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参与国政的制度，肇始于满清政权创设之初，体现了满洲统治者“国家政务，唯宗室协理”的排他性。它伴随着清朝入主中原的政治变迁而发展变化，随着国家的逐步统一和君主专政集权体制的加强，集体议政、权力分散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必然走向衰亡。一起一落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步从强势走向式微，也预示了清王朝鼎盛之时，便是议政制消亡之日。

# 齐桓公成于识人亡于不识人

□王洲洋

齐桓公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值得后世称道。当时齐国在齐桓公的主宰之下，加上管仲的辅助，国势强盛。但齐桓公仍不满足，依然到处搜罗治国人才。

一次，齐桓公派宰相管仲率领军队讨伐宋国。有一天，管仲命令军队在野地之中安营扎寨后，忽然一个打扮像乡野牧牛的人前来求见。此人自称宁戚，通过交谈，管仲感到此人谈论天下大事颇有见地，智勇双全，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想到齐桓公素来喜欢人才，便写了一封荐书，交给宁戚拿着去见齐国的国君齐桓公。

宁戚是个性格刚直的人，也很有头脑，他带着管仲的荐书来到了齐国，想验证一下齐桓公究竟是不是一个开明大度、唯贤是举的人。他见到齐桓公之后，并不急于出示管仲的推荐书，反而在朝堂之上讥讽齐桓公大逆不道，杀兄得位，滥用武力，以致民不聊生。最后说齐桓公虽然是五霸之首，但齐国的前景依然岌岌可危。从未听过如此忤逆之言的齐桓公不禁怒火中烧，喝令部下立即把宁戚推出去斩首。此刻，殿中武士将宁戚向外拖，但宁戚却怒目而视，神态威严，毫无惧色。齐桓公见宁戚如此威武不屈，怒火稍消，忽然对他生出了十二分敬重，觉得宁戚是个人才，就起了爱才之心，命令武士放了他，并奇怪地问：“我看先生不是等闲之人，到这里来应该不是仅仅羞辱寡人的吧，你有什么话尽管说。”这时宁戚才拿出管仲的推荐书，并说出自己向往明君的意愿。

齐桓公大惑不解：“你既有相国的荐书，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给我看？反而造成这么大的误会，让我差一点成了草菅人命的小人。”宁戚回答说：“在如今这个乱世，不但君主要选择能臣，能臣也要选择君主，主公若是个不爱听忠言真话，只喜欢阿谀奉承的人，我即使死了，也不会把荐书呈给主公，更不会做你的臣子。”

齐桓公听后，恍然大悟，对宁戚的做法大为赞赏。接着他们又谈起了天下大势，宁戚谈吐条理清楚，视野开阔，很多问题都说得头头是道。这些话很合齐桓公的口味，因此齐桓公感觉受益匪浅，自然欣喜不已，当即便要拜宁戚为官。有人反对齐桓公这样仓促做出决定，上谏道：“这儿离宁戚的故乡卫国不远，主公何不派人去调查一下？以防上当受骗。如果宁戚德才兼备，再封官也不迟。”齐桓公说：“我看宁戚这个人不拘小节，又性情刚烈正直，在家乡很可能会有过失，从而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倘若调查时有人说他的坏话，那就会造成错觉，就会动摇对一个人才的使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发现了这个人才就应该信任他，并坚定地去使用他。”最终齐桓公不再听那些人的劝阻，仍然拜宁戚为大夫。后来果然如齐桓公所料，宁戚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奇才，他文武双全，为齐桓公创立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得到众多人才的辅助之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而，巨大成功之后的齐桓公越来越注重君权之下的物欲享受，渐渐地失去了清醒的头脑，丧失了昔日对人的准确判断。

齐桓公生前非常宠幸三个人，一个叫竖刁，一个叫易牙，还有一个叫开方。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竖刁自小就生活在宫里，侍奉齐桓公的宠妃长卫姬等人。因为他不是太监，所以在他长到十多岁的时候，就应该搬离王宫了。但是，竖刁已经习惯了宫廷内闱的权力争斗，贪恋宫中的富贵生活，想获得更大的权力。于是，他一狠心，竟然把自己阉割了，当了一个宦官，主管皇宫内的一切事务。

易牙本来是王宫里的一个厨子，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跟竖刁很要好。于是，竖刁就想尽办法让易牙得齐桓公的重用。有一次，长卫姬突然得了厌食症，整日茶饭不思，齐桓公很是着急。这时候，竖刁就向齐桓公推荐了易牙。易牙不敢怠慢，费尽心思地做了一碗汤献给了长卫姬。长卫姬吃完之后，胃口大开，连声称赞易牙的厨艺，于是她就把易牙推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吃了易牙做的饭菜后也感觉很不错，于是就重重地赏了易牙。有一次，齐桓公开玩笑地对易牙说：“你做的饭菜的确很好，但是，人间的美味我都已经尝遍了，只是不知道人肉是什么滋味。”易牙听了之后，马上回去把自己年仅三岁的儿子杀了，做成了一盘蒸肉，献给了齐桓公。齐桓公听说这盘肉是易牙的儿子后，居然还被易牙的“忠心”所感动，就对他格外看重了。

开方是长卫姬的侄子，本来是卫国的太子，但卫国地处偏远地区，非常贫穷，他觉得这个太子做得没意思，于是就放弃了继承权，待在繁华富强的齐国，成为一名围绕着齐桓公打转转的幕僚。

这一切都被管仲看在眼里，他断定这三个人都是没有什么品德的人，于是就想找机会劝齐桓公远离他们。

由于过度操劳，管仲病倒了。齐桓公见他病得不轻，赶紧请教治国之道。管仲趁机说：“希望君主疏远易牙、竖刁、开方三个无用的大臣。”

齐桓公说：“易牙为了治疗寡人的病，杀了自己的儿子给我吃，还有可疑的吗？”管仲回答说：“爱自己的儿子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儿子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人的忠心可疑。”

齐桓公说：“竖刁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这还值得怀疑吗？”管仲回答说：“爱自己的身体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身体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这一点不可不防。”

齐桓公说：“开方侍奉我已经有十五年了，丝毫不敢懈怠，他连自己的父亲死去都不回去奔丧，这个人不能依赖吗？”管仲回答说：“爱自己的父亲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父亲都那么残忍，对君王又有什么不敢做的呢？”

管仲死后，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把易牙等三人流放远方。但是，齐桓公从此吃饭不知味，宫室不修理，旧病又经常发作。过了三年，齐桓公想：“仲父的看法是不是太片面了？”他糊涂地认为国家治理不够好与流放这三个人有很大关系，于是，又把三人召回，把国家治理的重任都交给他们。

第二年，齐桓公病重，易牙等三人乘机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重病的齐桓公被易牙与竖刁软禁，想要口水喝都不成，最终被活活地饿死在病榻上。齐桓公在识人上的悲剧，值得后人警醒。

中华春秋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和神养气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